



□吴弘毅

家在岳麓山下住，散步常会经过岳麓书院，不时便有游客请求帮忙拍张照片，背景就是书院头门上黑底金字的“千年学府”匾。这方匾集的是欧阳询楷书，落款为一九八六年十月，论历史远比不上正门由宋真宗御书的“岳麓书院”匾，但挂于头门作为游客参观第一站却再合适不过——岳麓书院最独特之处，正在于它是中国唯一传承千年仍“活着”的学府。

端详这块“头门招牌”，我不由得想：所谓千年，是从何时算起？有何为证？千年弦歌不绝奥秘何在？这一琢磨就想起了王禹偁的《潭州岳麓山书院记》。

千年历史，斯文为证。《潭州岳麓山书院记》是宋咸平三年（公元1000年）时黄州知州王禹偁应潭州知州李允则之请，为记录岳麓书院重建所写，是现存关于岳麓书院的记载里最早的文献。文中有“开宝中，尚书郎朱洞典长沙，左拾遗孙逢吉通理郡事，于岳麓山抱黄洞下肇启书院”一句。“开宝中”实为开宝九年（公元976年）。

有意思的是，王禹偁其实从未到过岳麓书院，其了解至多为文字或图画，那么潭州知州李允则为何不顾江湖阻隔，偏要请远在黄州的他“看图作文”呢？若是熟悉宋史或古代文学史的朋友，大概能脱口而出：就因为他是王禹偁啊。

王禹偁是济州巨野（今属山东省菏泽市）人，北宋政治改革先驱、著名直臣，因直言讽谏而一生三黜，政治抱负不得施展。但他亦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先驱，是文坛无可争议的执牛耳者。宋太宗盛赞“王禹偁文章，当今天下独步”，林逋推崇“纵横吾宋是黄州”，欧阳修叹服“想公风采常在，顾我文章不足论”，苏轼也钦赏他“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”。到今天，谈到北宋最早的小令就要数《点绛唇·感兴》，编宋诗选本就绕不过《村行》《清明》，翻开《古文观止》宋文开篇就是《待漏院记》《黄冈竹楼记》，作者都是王禹偁。所以，李允则请王禹偁撰文立记，实则是请来政坛清流、文坛顶流的如椽巨笔，给重建的岳麓书院最具分量的“身份加持”。

《宋史》载王禹偁“遇事敢言，喜臧否人物，以直躬行道为己任”，此铮铮风骨在《潭州岳麓山书院记》中可见一斑。自唐末而至五代战乱不断、官学凋敝，宋初统治者亦专注军事征讨与政权稳固，地方偶有贤吏倡导办学却往往人去政息。王禹偁将这份观察与忧虑融入记文之中，开篇便以“三代而下，两汉称理，次叙循吏，彰示后人”破题，提出“学校政之本欤”的论断，将朝代治乱兴衰、官员历史评价与教育事业之兴废紧密勾连。

记文中的潭州知州李允则，正是一位“有废必兴，无政不举”的循吏。

他临“至剧之郡”“下车布政，比屋允怀”，狱讼“决剔无留”，米盐“推行不倦”，应对岁歉“减佑发仓”“募兵置藉”。在安定民生的同时，重启岳麓文脉，“询问黄发，尽获故书，诱导青衿，肯构旧址”，确定“外敞门屋，中开讲堂，揭以书楼，序以客次”的建筑规制，又“塑先师十哲之像，画七十二贤”，并“请辟水田”“奏颁文疏”，打下书院存续之基。

对潭州历任官吏，记文同样褒贬分明。对开宝年间的朱洞与孙逢吉，充分肯定其“肇启书院，广延学徒”的开创之功，而对二人罢归后的继任者，则直言其失——正是他们“累政不嗣”，才造成岳麓书院“诸生逃解，六籍散亡，弦歌绝音，俎豆无睹”。这般不避同僚之阙、直陈本朝之弊的直笔，在古代碑记中实不多见。后之治潭州者读此记文，恐会冷汗涔涔、心中惕惕。

记文中有名的一句是“谁谓潇湘，兹为洙泗；谁谓荆蛮，兹为邹鲁”，湖南便是因此而得“潇湘洙泗”的雅称。不少人将这句话理解为王禹偁对岳麓书院的盛赞，细究之下，未必尽然。要知道文教之兴可非一日之功，彼时李允则重建书院不过一年，还没有桃李满天下的实绩，也未形成具有影响的学术流派，将其比作邹鲁洙泗这样的文化圣地有些言之过早。其实，若联系此句上文“使里人有必葺之志，学者无将落之忧”以及文末的“拙于叙事，聊书兴废”，便不难发现其恰可与王禹偁在同一年所写《黄冈竹楼记》中“后之人与我同志，嗣而葺之，庶斯楼之不朽也”两相印证：小竹楼的不朽，依赖于后之同志的接续修葺；岳麓书院的延续，同样离不开后人的坚守。所以，“潇湘洙泗”不是赞语，而应是寄语——冀望里人同心维护学者、潜心向学，而终使岳麓书院文脉延绵，潇湘之地文风蔚然。

写完《潭州岳麓山书院记》的第二年，王禹偁病逝，终年48岁。这位一生“屈于身兮不屈其道”的理想主义者在这篇记文的最后追述：自己“占籍济上”，那时李允则先父李谦溥刺守济州（今山东济宁），崇儒重教，每自出俸钱奖励应试之士，当时的人都认为很难做到，李允则正是受家风影响而“不忘儒学”。其实，出身“磨家儿”的王禹偁很有可能正是当年被支持、受奖掖的学子之一，青少年时的经历让他立下崇文守道的志向，伴他历经三黜而不改初心，如今又借这篇记文，将薪火传予后世。

正如王禹偁所言，“人存政举，岂系古今”。此后千年，岳麓书院历经朝代变迁战火天灾，却始终有同心同志者接续努力，让书院一次次坚韧地涅槃重生，七毁七建而弦歌不绝。我想，若将《潭州岳麓山书院记》刻碑立于书院头门前，供游客与学子驻足品悟，或许便可见得千年学府的奥秘。

□最难

追溯“元旦”二字的本源，早有典籍为其注解。《说文解字》言“元，始也”，《诗经》中“旦复旦兮”则道尽晨光熹微之景，二者相合，便成了“新年第一日”的专属称谓。

“元旦”这一称谓最早见于南朝梁的《雅乐歌》，“四气新元旦，万寿初今朝”，寥寥十字，写尽了辞旧迎新的庄重。只是彼时的元旦，与今日并非同一时日。夏代以正月初一为元旦，商代挪至十二月初一，周代又改到十一月初一，直到汉武帝时期，司马迁创制《太初历》，才将元旦的日期定格在正月初一，此后沿承千年，直至辛亥革命后，阳历1月1日才接过“元旦”之名。

跨年活动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。当时的贵族，已懂得在辞旧迎新时丝竹悦耳，歌舞蹁跹。到了东汉，跨年的热闹更添几分惊险与奇趣。人们不再满足于案头的丝竹，转而涌向街头，看艺人们走绳如履平地，观幻术师藏人无影无踪。

南朝的跨年，则是一场浸润着烟火气的盛宴。跨年夜的宴席上，酒香浮动，笑语盈盈，人们身着新衣，长幼有序，互相拜贺。最有趣的莫过于“乞如意”的祈福游戏——将锦人埋入灰堆，手执木棒轻轻敲打，口中一遍遍唤着“如意如意”。这简单的仪式里，藏着古人最朴素的心愿，愿新岁无灾无难，愿所求皆能如愿。梁人宗懔在《荆楚岁时记》里，细致记下了元旦的光景：“正月一日……长幼悉正衣冠，以次拜贺。进椒柏酒，饮桃汤。进屠苏酒、胶牙饧，下五辛盘。”一杯椒柏酒驱邪避秽，一碗桃汤寓意吉祥，一口屠苏酒迎新纳福，一盘五辛盘开胃醒神。

宫廷之中，最具仪式感的元旦玩乐当数“排正仗”朝会。这不仅是彰显国威的礼仪盛典，更蕴含着外交互动与君臣同乐的意味。

北宋时期，宫廷元旦朝会规模宏大且规制严明，宋·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六《元旦朝日》明确记载：“车驾坐大庆殿，有介胄长大人四人立于殿角，谓之‘镇殿将军’。诸国使人入贺。殿庭列法驾仪仗，百官皆冠冕朝服……大辽大使顶金冠，后檐尖长，如大莲叶，服紫窄袍……副使展裹金带，如汉服。大使拜则立左足，跪右足，以两手著右肩为一拜，副使拜如汉仪”。当时，除辽国外，夏国、高丽、回纥、于阗等多国使者均会按本国礼仪入朝恭贺，各州进奏官还会携带方物入献。朝会之上，礼仪井然，歌舞相伴，后续更有伴射、赐宴等互动环节，若伴射者取胜，“京师市井儿遮路争献口号，观者如堵”。

除了庄重的朝会，宫廷元旦还会举办兼具观赏性与娱乐性的国宴演出。据《东京

梦华录》及苏轼《紫宸殿正旦教坊词》等记载，宋代元旦国宴遵循固定礼制，需依次饮用九盏御酒，每盏酒对应特定文娛节目，仪式、座次、行酒、乐舞等环节缺一不可。演出由“竹竿子”（报幕员）主持，节目品类丰富且规制清晰：前两盏酒时，有“歌板色”（教坊歌手）唱曲、舞者对舞；第三盏酒上演“百戏”，含上竿、跳索、倒立等杂技表演；第五盏酒有二百余名少年组成的“小儿队”登场群舞合唱；随后上演宋杂剧（滑稽戏），兼具娱乐性与讽谏意；第六盏酒安排皇家蹴鞠队对垒，得胜方获“银碗锦彩”赏赐；第九盏酒则由皇家相扑手上场表演，直至相扑结束，“竹竿子”致谢幕词，演出方告落幕。这套完整的国宴演出，汇聚了当时顶尖演艺水准，在欢庆中辞旧迎新，其热闹程度与文化纪念意义均有史料佐证。

市井民间，最受欢迎的元旦玩乐则是“关扑”。这种博彩类游戏，在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已出现，平日受官府限制，仅在元旦等重大节日开放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元旦期间参与关扑的商家，店内物品既可购买亦可通过关扑获取，玩法以投掷铜钱为主，参与双方先约定物品价格，再将铜钱掷于瓦罐内或地上，根据铜钱字面朝上的数量判定输赢，赢者可折钱取走所扑物品，输者则需付钱。关扑的赌注范围广泛，小到日常物件，大到车马、地宅等均有记载。元旦当晚女子可破例进入赌场观赌或入店赴宴，《东京梦华录》明确提及这种情形：“惯习成风，不相笑讶”。

相较于关扑的热闹刺激，明朝民间还有一种浪漫雅致的元旦玩乐——互赠笺纸贺年。据相关史料记载，明朝天顺年间，民间已开始流行赠送贺年卡，人们会选用二寸宽、三寸长的笺纸，部分还会印制梅花等精美图案，工整书写姓名、地址及新年祝福，于元旦当日赠送给亲朋好友。这种笺纸贺礼不仅传递新年喜悦，更承载着亲友间的深情厚谊，逐渐成为文人雅士与寻常百姓共同喜爱的新年活动。这一记载清晰表明，现代常见的贺卡祝福习俗，早在明代便已形成，且自带手作的温度与雅致情怀。

文人笔下的元旦，更是情感与哲思的融合。王安石的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”，以市井烟火写尽新年的蓬勃生机，成了刻在国人记忆里的元旦符号；孟浩然的《田家元日》，则将视角投向乡野，“桑野就耕父，荷锄随牧童”的画面，道尽了农人对丰年的期盼，也藏着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；而白居易笔下“岁盏后推蓝尾酒，春盘先劝胶牙饧”的家宴，把亲情的温暖与节日的惬意揉成了一团，读来满是人间烟火的治愈。

【短史记】

一元复始迎新来